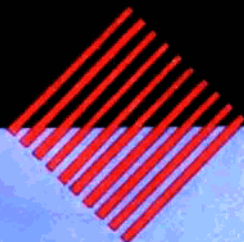


中国投资规模膨胀 问题研究

●王庆功 巨荣良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6
B12.4

后 记

投资规模的周期性膨胀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它不仅造成国民经济增长的超常波动，严重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而且危及通货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安定。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投资规模膨胀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状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治理对策的盲目性和短期性。因此，深入开展对投资膨胀问题的研究，分析探讨投资膨胀的成因及后果，寻求治理的有效对策，是经济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选择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中国投资规模膨胀问题研究”课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本书终于脱稿并与读者见面了。

本课题获得了山东省教委重点科研资助。在撰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吸收了理论界有关研究成果，并将主要参考文献呈予书后，在此对有关学者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山东省教委、聊城师院科研处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刘文君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文责作者自负。

王庆功 巨葵良

1995. 6. 10 于聊城师院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合理投资规模的界定	8
1.1 投资规模概念的界定	9
一、投资的概念	9
二、投资规模的概念和类型	12
1.2 年度投资规模与在建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15
一、年度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15
二、在建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19
1.3 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的依据、原则及其意义	22
一、确定投资规模的理论依据	22
二、确定投资规模的基本原则	26
三、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的意义	31
1.4 适度投资率的确定	33
一、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的制约因素	33
二、合理投资规模的理论模型	35
三、适度投资率	41
第二章 中国投资规模膨胀的历史考察	54
2.1 投资规模膨胀及类型划分	54
一、投资规模膨胀的含义	54
二、投资规模膨胀的类型	55
2.2 投资规模膨胀的历史回顾与实证分析	59
一、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投资规模膨胀	59
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投资规模膨胀	63

三、中国投资规模膨胀的类型及特点	70
2.3 80年代中期的“投资膨胀论”与“投资 不足论”之争	77
2.4 投资总量悖论：膨胀与不足并存	85
第三章 中国投资规模膨胀的形成机理	92
3.1 投资规模膨胀成因的经典分析	92
一、卡莱茨基对社会主义投资膨胀形成的分析	92
二、科尔奈对社会主义投资膨胀成因的解释	94
3.2 投资规模膨胀形成的决策机制分析	96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是我国投资规模 周期性膨胀的重要原因	95
二、经济增长模式选择对投资膨胀的影响	98
三、投资决策分散化和投资审批权限的下放 是80年代中期投资失控的重要原因	101
四、投资决定中可行性研究蜕变为“可批 性研究”，加剧了投资规模扩张	102
3.3 投资规模膨胀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	104
一、区位利益和财政包干体制的激励	104
二、人口膨胀造成的就业压力	108
三、政府官员的行政升迁动机和投资规模扩张	109
3.4 投资规模膨胀形成的约束机制分析	110
一、扭曲的投资收益——成本结构与投资需求膨胀	110
二、投资资金来源的约束	112
三、投资风险约束	113
四、投资责任约束	114
3.5 投资规模膨胀形成的调控机制分析	115
一、价格杠杆调控——比价扭曲、信号失真	115
二、预算外投资调控缺位，银行信贷失控	117

第四章 投资规模膨胀与经济波动	119
4.1 中国经济波动态势的实证分析	120
一、经济波动的含义及类型	120
二、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123
4.2 投资总量波动与经济波动	127
一、经济波动的成因分析	127
二、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	134
三、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关系的观点介评	145
4.3 投资规模膨胀与超常经济波动	149
一、超常经济波动的含义	149
二、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超常经济波动	151
三、投资规模膨胀与超常经济波动	156
第五章 投资规模膨胀与通货膨胀	162
5.1 中国通货膨胀的简要考察	163
5.2 投资与货币运动	166
一、投资与货币投放	167
二、投资与货币回笼	169
5.3 投资规模膨胀与通货膨胀	170
一、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	171
二、信贷规模与通货膨胀	175
三、投资膨胀与通货膨胀	178
5.4 投资膨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182
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183
二、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185
第六章 投资规模膨胀与投资效益	189

6.1 投资经济效益及其特征	189
一、投资经济效益的内涵	190
二、投资经济效益的特征	191
6.2 投资规模膨胀与投资效益的历史考察	192
一、投资膨胀与投资效果系数的变化	193
二、投资膨胀与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变化	199
三、投资膨胀与大中型建设项目投资率的变化	202
四、投资膨胀与固定资产设备开工率的变化	203
6.3 投资膨胀导致投资经济效益下降:原因和机制	205
一、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与收缩,必然造成总供给 与总需求失衡,导致宏观投资效益下降	206
二、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必然会造成投资结构失调 和产业结构恶化,导致资源配置效益下降	207
三、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与收缩,必然造成经济 发展的频繁起伏波动,导致实际经济效益下降	209
四、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必然会加剧 资金的紧张,导致资金利用率降低	210
第七章 治理投资规模膨胀的对策	212
7.1 防止投资规模膨胀的关键在于深化 投资体制改革	213
一、传统投资体制的基本特征	213
二、十六年来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进展	215
三、现行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与“投资饥渴症”	217
四、根本出路: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投资体制	220
7.2 推进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 主体行为	221
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两种基本职能的分离	221

二、严格划分投资界限,规范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方式	223
三、建立和强化地方政府投资约束机制	226
7.3 确定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强化投资风险	
约束机制	228
一、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塑造真正的企业投资主体	228
二、实行企业法人责任制	230
三、投资主体决策项目必须与其财力相适应	231
四、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	232
7.4 加快建立新型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	233
一、投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233
二、投资宏观调控的目标	234
三、投资总量的宏观调控	237
四、综合运用投资调控的各种手段,强化对 投资主体的调控	242

引 论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主要生长点。它既影响社会供给,又影响社会需求,既决定着经济的历史演变,又决定着经济的未来动态。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快慢和稳定协调与否,同一定时期的投资规模是否适度密切相关。一定时期无论投资规模过大还是过小,都会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均离不开投资推动。但是,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是各生产要素、技术、体制、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经济增长中依靠投资带动的程度,人们通常把经济发展类型分为两种即:投资主导型经济和非投资主导型经济。如果一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来带动的,则可称为投资主导型经济。如果一国经济增长是在较小程度上依靠投资来带动的,则可称之为非投资主导型经济。

一般而言,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通常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奠定工业发展基础,往往需要较多投资。一定经济增长率往往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来推动。而当经济系统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后,投资总量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会日趋减弱,而其补充性要素以及由这些补充性要素所决定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投资的推动。人们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各要素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凤波同志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中,通过各要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所起作用的测算和国际比较分析,用数字告诉我们,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显示出了投资主导型经济的特征。这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较高投资率来推动的。正是由于我国投资主导型经济的这一特征,演化和变异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常常形成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在我国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投资规模膨胀曾经反复出现,几乎成为痼疾顽症。它像一个幽灵,几乎每次发展时期都有它形影相随,不断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投下一个个令人忧心的阴影。它不仅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恶性经济波动,给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危及我国社会生活的安定。

按照大多数经济学家们的划分,人们通常认为:建国以来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生过四次大的投资规模膨胀。第一次发生在1958年三年“大跃进”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58年由1957年的177亿猛增到279亿元,投资增长率达到87.7%。这是中外建设史上所罕见的。1958—1960年三年投资总额相当于“一五”时期的两倍,积累率高达39.3%。这次规模膨胀加上内忧外患,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从

1961年起,不得不大幅度压缩投资,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大调整。第二次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69年为246.92亿元,比1968年增长62.9%,1970年又猛增112亿元,增长49.1%,当年大中型建设项目增加200多个,积累率达到34%左右。这次投资规模膨胀发生在十年动乱时期,给我国的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次发生在70年代末。1978年的投资增长率达到31%,大中型项目迅速增加,一下子增加了290个,特别是22项成套引进项目,投资巨大,配套项目多,强烈刺激着投资扩张,积累率猛升到36.5%。这次投资规模膨胀很快引起重视,并在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得到控制。第四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的全社会投资增长率达38%,在建项目计划投资总规模增加1800多亿元,达到13400多亿(如果考虑到投资超概算实际上要大大高于这个数字),积累率又一次上升到35%。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之前。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在这种投资膨胀——压缩——再膨胀——再压缩的怪圈中运行的历史。那么,如何走出这种怪圈?如何有效地防止投资规模的周期性膨胀?这是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和投资管理部门的一大难题。对此,我国理论界曾经作过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并开出过许多“药方”,中央政府及投资管理部门,在某些时期也几乎达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有人曾作过一个统计,在中央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中,有关控制投资规模、清理在建项目、防止投资规模膨胀的文件不排第一,也至少名列前茅。然而,一方面,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我国理论界难以开展对于投资规模及其膨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以致造成了治理对策上的短期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或最高的战略目标。这样,在

高经济增长率的压力下,形势稍好一些,就在“投资饥渴症”的强劲驱动下,使投资率陡然上升。当高投资率和高速度由于受各种条件制约难以为继时,接着就是压缩投资率,被迫进行经济调整,从而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1979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原国家建委组织的一次基本建设研究会上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谁能提出根治中国投资膨胀的有效对策,就应授予博士称号”。

如果说中国前四十年的四次投资膨胀,是在特定的体制背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么,这个曾长期困扰中国经济运行的难题,是否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迎刃而解呢?有的同志认为,投资膨胀是特定体制下反映特定经济现象的一个特定概念,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然而,我们认为,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至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阶段,或者说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在这一阶段中,投资规模膨胀赖以滋生的土壤不会完全铲除。如果我们分析一下1992—1993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92—1993年中国投资增长属于高速增长,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从投资规模上看,1992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82亿元,增长37.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建总规模为2.79万亿元,比上年扩大9180亿元,增长49%。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1829万亿元,超过计划3829亿,超幅为47.9%。这里是完成的投资绝对额,当然包含有价格上涨因素在内。而投资率由于分子、分母都按现价计算,抵消了价格上涨因素。1993年计划安排的投资率,指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据统计资料计算,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9.5%,1993年达到42%左右。这些实际完成的投资率,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历

史经验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旦突破 30%,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就会感到紧张甚至比例失调。近年来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都绷得很紧,其原因盖出于此。从货币投放看,1993 年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0.6%,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0.6%。这是把货币需求向上拉动的重要原因。由于投资急剧膨胀,引起货币投放的猛增,1992 年投放 1158 亿元,1993 年又创记录地投放 1529 亿元,相当于 80 年代后五年投放总和(1985—1989 年共投放 1552 亿元)。从通货膨胀的态势看,1992—1993 年物价全面地、持续地上涨。投资膨胀引起货币增加是“因”,物价上涨是“果”。1992 年财政赤字近 900 亿元。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1992 年上涨 6.4%,1993 年在此基础上又上涨 14.7%,1993 年零售物价指数在 1992 年上涨 5.4%的基础上又上涨 13%。1992 年通货膨胀率是建国四十年来第四次突破两位数。如果从这些数字和现象看,它与前四次投资膨胀是极为相似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它是第五次投资规模膨胀呢?对此我国理论界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投资饥饿症”还远没有消除,投资扩张随时可能发生。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多年后,我国投资规模为什么会再度失控?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投资决策与投资风险脱节的问题没有解决。原有的投资扩张机制有些淡化,但没有消除。自上而下起哄的办法还没有杜绝,而自下而上的投资扩张机制又在加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先后实行了企业留利制度、财政分灶吃饭和地区部门大包干。实行这些办法,对调动地方、部门、企业的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急剧地减少了中央掌握的财力,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助长了国民经济的混乱现象;强化了条块割据,分裂了国内统一市场。其结果是盲目建设,重复引进,

项目小型化、轻型化。条块割据不仅在我国形成了一种极为分散的投资扩张机制,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严重的结构扭曲机制,从而使我国投资规模膨胀与结构扭曲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因为有了这种自发的投资膨胀机制,在党中央提倡加快经济发展时,上下一拍即合,迅速形成投资规模的膨胀和经济过热。针对我国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势头,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使投资规模强劲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但也应当看到,投资形势不容乐观。1994年6月,我国经济学界权威人士在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状况时曾发出这样的警告:尽管我国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但目前多方面投资需求依然强劲,若要把投资压缩到适当规模仍然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要严格控制投资规模,防止投资规模再度膨胀。

中国的投资规模会再度膨胀吗?这是许多人悬在心头的一个疑虑。

我们认为,有的学者说得好,深层次的问题不在于争论中国投资会不会再度膨胀,而在于能否提出根治中国投资膨胀的有效对策,在于能不能从根本上清除滋生中国投资膨胀现象的土壤。

这是摆在我国投资理论研究工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要完成这一课题,首先必须对我国投资规模及其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理论探讨,只有从理论上真正透彻地揭示了我国投资规模膨胀的原因及形成机理,才有可能提出根治投资规模膨胀的有效对策。这也正是我们撰写本书的主旨和目的所在。

判断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投资规模膨胀与否,首要的问题是对什么是适度投资规模进行界定。这是本书第一部分亦即第一章的任务。我们认为,决定适度投资规模的适度投资率是一个动态指标,没有也不可能绝对适合各个时期的适度投资率。但

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总有其决定适度投资规模的合理投资率区间。要对一定时期的投资规模是否适度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关键在于适度投资率区间的确定问题。因此本章在对合理投资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基本原则进行分析,并给出适度投资规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适度投资率区间的决定问题。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五、六章。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我国建国以来投资规模膨胀进行历史考察,并对我国的投资规模膨胀类型进行分析;然后重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投资规模膨胀原因、形成机理以及特点进行探讨;再分别对投资膨胀与经济波动关系,投资膨胀与通货膨胀关系,投资膨胀与经济效益关系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论证投资膨胀给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造成的危害性。

第三部分即第七章,重点探讨治理我国投资规模膨胀的有效对策。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因此,治理我国投资规模膨胀,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通过再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中国的企业成为面向市场的真正的投资主体,形成投资决策自主、投资风险自负的微观投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投资宏观管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铲除我国滋生投资规模膨胀的土壤。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江泽民)

第一章 合理投资规模的界定

要保持并实现一定时期的合理的投资规模,关键在于确定其适度投资率。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投资规模的扩张还是投资规模的收缩都要受到一定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即投资规模有一个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在这个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广阔的调节和选择区间,而适度投资率则是其中的最优区域。为了寻求一定时期的适度投资率,本章重点对我国投资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变化趋势和基本原则进行分析,并对有关理论和经验加以探讨和说明。

1.1 投资规模概念的界定

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投资、投资规模、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概念。严格地说,这些概念含义是不同的。但是,我国的有关书籍、报纸、杂志在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存在着较大的混乱,含义比较笼统。因此,要深入系统地研究投资规模及其膨胀问题,首先必须对投资和投资规模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投资的概念

投资是投资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包含较多层次的经济范畴。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这一概念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概括。

国内较有权威的《辞海》和《经济大辞典》,对投资概念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辞海》对投资概念的释文是:“(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获取利润而投放资本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行为。主要通过购买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来实现。(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是指基本建设投资。”《经济大辞典》中的《金融卷》把投资定义为“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预先垫支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些事业的行为。”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投资的一般含义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指为了将来获得收益或规避风险而进行的资金投放活动。二是指投资的资金。投资按其投放的途径、方式可分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实物投资与金融投资、实业投资与证券投资

资。就直接投资、实物投资、实业投资来说,都是指投资者用资金去建立生产力,形成使用价值,以求生产出具有竞争力、销路好、盈利高的产品。就间接投资、金融投资、证券投资来说,都是投资者用资金去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金融商品,其目的是带来价值的增值。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投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学者根据美国投资经济学家杜立和傅丽的划分方式,^①把投资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所谓广义的投资,可以泛指一切金融证券投资和产业(实业)投资,生产性投性和非生产性投资。它是指在一定时间以预期收益或效益为目的而把收入变换为资产的货币垫支和资本形成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剩余产品转化为积累的过程。所谓狭义的投资,专指产业(实业)投资,而不包括金融证券投资。它是指为了建立新的生产力和维护补偿原有生产力以及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建设,用于增加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技术成果以及原材料库存等一切资产的建设 and 费用,以谋求增加收益或效益的货币垫支和资产形成过程。狭义的投资既包括生产性投资,也包括流动资产投资;既包括扩大再生产投资,也包括简单再生产投资。本书所涉及的投资概念主要是指狭义投资中的固定资产投资。

在西方投资学中,投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其内涵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狭义的投资仅限于证券投资,包括个人及公司以其资本从事证券买卖而坐享收益,俗称“剪息票”。广义的投资是指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使用,或获取收益,或使资本增值,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凡购进各种证券,运用资本增添机器设备、建筑物、原料等行为,均为投资。

^① 参见《投资学》,蒋友文译,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第2页。